中俄北京贸易初探

苏全有

Chinese began to do business with Russian in Beijing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trade reached its peak after the Treaty of Nerchinst was signed . Most of the trade caravan to China were nongovernmental before 1697, but after that "official" businessmen came . It was not until the 1760s, with the rising of the Kiakhta Trade , that the Beijing trade ended. The merchandise in the Beijing trade was mainly leather, cloth and a little tea. This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Kiakhta Trade which focused on tea and leather. Further more , the Beijing trade was characterized by free trade .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d a real interest in this trade and made a great profit from the bilateral trade; Conversely,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little interest and gained much less.

在早期中俄贸易史上，北京贸易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一贸易对两个相邻的大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北京贸易并未象恰克图贸易一样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因此，探讨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从蒙古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关系就已经建立，当时俄国商人把毛皮、皮革以及其它本国产品运往北京，M·舍尔乌德在《通往中国的大道》一书中说，在北京的外国商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其中就有俄国人。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贸易关系并不密切，更多的只是偶然的现象。而且由于蒙古地区在十五、六世纪的相对不稳定，导致了中俄两国在17世纪初叶以前的贸易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俄国在15世纪末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之后，积极对外侵略扩张，向北针对瑞典，向西针对波兰，南方是土耳其，东方是中国。随着战争的连绵不断，再加上沙皇、贵族的奢侈无度，财政状况极端恶化，于是通过对华贸易以获取大量的金银、宝石，从而解决财政困难，对俄国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为此，俄国在17世纪初开始派使臣来华，其主要使命即为开拓商务。1618年伊凡·佩特林和昂德鲁什卡·蒙多夫作为俄使第一次来华，使臣虽未获得中国皇帝的接见，但明朝政府却颁发文书给予俄国通商的许可："尔可往来通商…可将吾两国道路障碍扫除，俾得往来便利。"与此同时，俄使也洞悉："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饶，所产金银丝绸，尤为俄人所珍羡，俄京哄动一时。"[1] 在此背景之下，俄国政府于17世纪中叶接连派出几个通商性质的急使级或公使级使团来华，如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使团、谢伊特库尔·阿勃夫使团、尼古拉·林斯帕法里使团等，他们在贸易上都获成功，其中1668年阿勃林使团运来毛皮价值4500卢布，获利在3倍以上[2]。但经贸谈判却无进展。在此前后的数十年间，哥萨克的侵扰使两国兵戎相见，经贸谈判一拖再拖，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才又重现曙光。双方出于共同的和平愿望签

订了《尼布楚条约》,其通商规定是:“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3]此前的中俄贸易在北京时有进行,如前往北京的俄使多随带进行一定数量的贸易。但应看到,这类贸易的数额不大,而在17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内,处于中介地位的中亚布哈拉人在中俄两国之间贩运的货物数额却较大,且很频繁,因此,大规模的、正式的北京贸易的开始起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对该条约通商规定的补充条款是1693年确定的,其内容是俄国商队前来北京贸易的“人不得过二百名,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定限八十日起程。”[4]

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之日起到1697年期间,是私商赴京贸易的兴盛期。1689年第一个私商集团来华,带来60大车兽皮,随后运出14464卢布的丝织品等货物。1691—1692年间,普洛特尼科夫等率领第二个私人商队以价值7562卢布的皮货换回23591卢布的中国货,莫洛多伊等人率领的商队则以5592卢布的皮货换回价值12745卢布的中国货。[5]1692年伊兹勃兰特·火杰斯使华时,携带价值17000卢布的货物,换回价值37900多卢布的中国货,还不包括使臣本人的货物在内。[6]1693—1695年间有两个商队来华。1696年,以菲拉季耶夫为首的俄商输出价值49333卢布的毛皮。1697年,俄国对华输出皮货等的总值超过24万卢布。[7]从前面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1689—1697年期间的北京贸易额的增长速度非常迅速,俄国输出货物总值由数千卢布猛增至24万卢布。可见,《尼布楚条约》的通商条款确实给中俄贸易打通了道路。另外,联合成集团的俄国私商前来北京的次数频繁。第一支私人商队来华的时间是1689年12月,截止到1697年,仅8年多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有七次商队来华。

中俄贸易的迅速发展及有利可图,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极大热情,于是俄廷下令禁止私商自组商队去北京贸易,而由国家组织官方商队来华,作为让步,允许私商参加国家商队(截止于1706年1月28日)。1698年第一支国家商队郎古索夫和萨瓦齐耶甫商队来京,至此时起到1718年的20年间,俄国来京官方商队共达十次。综观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可以看出,贸易仍然是以货易货为主。由于清廷禁止金银出口,“不可能用俄罗斯的商品在中国换取大量的金银,因为中国的金子很贵,也难于[取得],实际上很少有人带金子到那里”即俄馆参加贸易,“他们只是为了换取银子才卖掉金子”[8]。虽然换取大量金银的目的落空,但“俄人于北京贸易获利甚厚,是时以价值一千卢布之俄国货物在北京所换取的货物,于俄京可售六千卢布。”[9]1701年俄国第二个来华的国家商队获利在43000卢布以上,[10]1706年奥斯科尔科夫商队获利55000卢布,1708年胡佳科夫商队获利更高达27万卢布。[11]1698年后国家商队大致每隔一年到北京贸易一次,而不是三年一次;货物大致相似,即以俄国的皮货换取中国的绸缎、棉布等,但在1716年记载商品的表格上也有了新商品,如海象牙(一种鱼骨)、大茴香子和茶叶;[12]贸易人数不断增加,已达近千人,而中国政府只是在1712年应俄国商人的要求同意增加20人的限额,即220人;至于货物价格,中俄两国商品的差价悬殊,如1706年北京的黑貂皮价格是西伯利亚的三倍,松鼠皮是五倍到七倍半,红貂皮是三又三分之一倍到六倍。[13]当然,在1696—1716年间,俄国皮货由于充滞市场而导致跌价5%—60%不等,而中国货仍大体维持固定的价格,那些消费者需要的主要商品,大体价格不变,[14]这导致了两国商品差价少有缩小。

随着两国北京贸易的进行,逐渐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诸多不满。原因首先是,中国必须负担俄国商队人员的食住费用,还得给他们照料牲口,又得在他们来去的路上派一队人担负护送任务,以致清政府所费不赀,不堪其烦。其次是清廷由于受小农经济的制约,对两国贸易不感兴趣。清廷大臣曾对俄商务专员表示:我等视商务为无足轻重,若康熙帝不以宽大为怀,俄商队

即不易来华。[15]第三，俄国商品价格太高，货物堆积如山。俄商在京贸易多自行定价逐什一之利以图自肥，中国官员曾抱怨说："富有者一旦相买，贵方商人立即高价勒索，很难成交。若为皇室购买皮货，则不肯出示好货，即使出示，也价格昂贵，枉费口舌。"[16]中国的皮毛来源除俄国外，每年还有欧洲船舶驶来广州及其他口岸，且我国各地本国猎人甚多，因此，各种货物都很充裕。再加上残酷的封建剥削造成的购买力低下，当时我国北方气候有所偏暖等原因，致使俄国皮货积压，难以在规定的80日内售出。这样一方面导致俄商在京迁延时日，以致赊卖，引起商务纠纷，另一方面导致俄商在满蒙地区走私，令清政府十分不安。再由于清政府希图划界得不到俄国满意的答复，这一切都引发了贸易危机。1719年，理藩院致信俄国，表明今后将暂时不再放俄国商人入境，若俄国商人中有愿交易者，希留在色楞格斯克，可在该地交易。对此，俄国派伊兹马依洛夫使华。由于700蒙古逃人事件，[17]致使伊兹马依洛夫使命难酬，但清廷出于和平愿望对他优礼相待，并允许伊斯托尼哥夫商队进京贸易。雍正皇帝继位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由于在逃人、划界诸问题上的矛盾，清廷决定在贸易问题上反击俄国。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俄国一开始试图报复，但由于作用甚微以及为求得贸易的发展，开始改变态度，双方立场渐趋接近，并于1727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其中通商规定如下："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隔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18]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于1722年就被俄国政府批准来华的那支俄国商队获得许可前往北京贸易，商队所携带的商品价值将近1000万法郎，其中主要是各种毛皮。商队带回了100万公尺丝绸和棉布，大约3万磅茶叶，此外还有金银和其它物品。[19]1731年第二批俄国商队来华，1736年第三批商队前往北京，两次商队所携带的毛皮价值基本相等，约10万卢布左右。[20]中国人对俄国货物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以致在短时间内俄国商人就卖出了各种货物达数万件。俄商在北京受到了良好的接待，理藩院在俄馆门口张贴告示宣布贸易对外开放，这类告示所起的作用是俄商得以很快将所携带来的商品售卖完毕。1739年第四批官家商队前来北京，1744年第五批官家商队来华，贸易进展得很不顺利，第四批商队总管叶罗费伊·菲尔索夫"非常懊悔前此未能知悉商队应该给中国人多运来一些什么货物，"第五批商队的货物"积存难销，剩下的货物不得不按实价打对折卖掉，因而也就无利可图了。"[21]1753年第六批商队前来北京，由于间隔时间较长，贸易情况稍有好转。1762年俄国政府宣布废除私人贸易的禁令，并委派信使克罗波托夫组织并监督前往北京贸易的私人商队，虽然信使尽力在伊尔库次克、恰克图召集私商参加，但没有成功，前往北京的商队贸易结束了。综观这一时期的中俄商队贸易可以看出，官方商队包揽的北京贸易日趋衰落，俄国政府禁止私人贸易的规定扼杀了北京贸易，这促使俄国政府被迫在60年代初废除禁令。当然，北京贸易的衰落也与恰克图贸易的兴盛并取代北京成为中俄贸易的重心，清政府不愿俄国商人到自己的统治中心贸易的心理不无关系。

前面我们论述了北京贸易的基本过程，下面笔者拟就北京贸易中茶叶、皮货的地位、贸易的自由特色及清政府的态度作初步探讨。

茶叶的地位

1616年伊凡·彼得罗夫出使阿勒坦汗廷，在宴会上，"端上来的饮料是加黄油的热牛奶，里面放着一种不知叫什么的叶子；"这种俄国人"从未见过"的叶子，即是茶叶。[22]1618年，明朝使臣携带茶叶数箱献给沙皇，企图以茶换货，未成。1638—1640年，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出使

阿勒坦汗廷,受到达音诺彦的宴请,席间他们喝的是茶,斯塔尔科夫说:茶叶是我从未耳闻目睹过的新东西,他们称这种饮料为茶,里面有叶子,我不知道这是树叶还是草叶。临行时,阿勒坦汗赠 给沙皇许多礼品,有皮货、绸缎以及按蒙古人估价相当于一百张貂皮价格的茶叶二百包。斯塔尔科夫对茶叶一项提出了异议,说在俄国,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因此,莫斯科宫廷宁愿请汗赠以相等价值的貂皮。但是结果仍按原来方案处理。此项茶叶约 245 公斤多一点,价值约合旧卢布 30 个。[27]这是华茶输俄的开端,比华茶输入荷兰晚了 30 多年。由上可见,茶叶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对俄国人来说还是新奇之物。华茶输入俄国的道路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后者为海上贸易,前者为陆路通商,正因为如此,输俄华茶的质量上乘,"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28]究其原因,正如魏源所说:"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29]俄国人对茶叶的称呼亦与西方其它国家不同,"英人呼茶曰替,法人呼茶曰代,俄人呼茶曰柴,茶柴二音相似,以其贩走北路故也。"[30]

清初,茶叶扮演着礼品与商品的双重角色。巴伊科夫在北京的半年期内,清廷赐予俄使及随从每天茶叶数磅。巴伊科夫在京贸易期间所购买的货物中也有茶叶。1657 年从中国归国的俄使彼得·亚雷日金购买了茶叶一皮囊。1658 年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尔·阿勃林奉命前往中国,清廷赐给他们茶叶十普特,俄使将茶叶全部卖掉换取宝石回国。斯帕法里使华期间,康熙帝多次赐予茶食,临行时还赠给沙皇茶 12 箱、使臣 1 箱、两位莫斯科贵族 2 箱。[31]其他使臣也多次受赐茶叶。茶叶作为商品在俄国销售始于 17 世纪中期以后。《十七世纪托波尔斯克市场的中国货》一文中提到 17 世纪后期托波尔斯克市场上有华茶出售。1674 年莫斯科也有华茶售卖。[32]北京贸易开始后的 1689 年,俄商加·罗·尼基丁来华贸易,采购了 5 普特 7 俄磅的茶叶。[33]之后来京的俄国官家商队,主要采购绸缎、棉布、宝石、金银等,1716 年来华的商队始成交茶叶,茶叶开始成为北京贸易中俄国商队采购的正式商品之一。1719 年,俄廷训令伊兹马伊洛夫"把茶叶放在用铅皮衬里的匣子里,并加密封,以防掺假。"1725 年,俄商务部训令商务代表郎克"应注意将茶叶(烟草)装入铅皮箱内,每箱重量约为一百斤,加盖并从上方焊好,以免香味散失。"[34]可见,茶叶作为商品已受到了重视。1725 年,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从中国带回的货物中列出了茶叶一项,其地位、重要性在绸缎、金银之后。在 1727 年至 1755 年间的六次商队贸易中,茶叶贸易的规模扩展不大。货物品类,俄国主要是毛皮,中国主要是布,即皮布贸易。

总的说来,俄国在 17 世纪主要从中国进口南京土布、大布、丝织品(各种绸缎)和生丝、某些辛香作料和药材,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相对来说数量不大,因为当时在俄国饮茶的习惯还不普遍。18 世纪的北京贸易期间,茶叶贸易额在缓慢发展。到了恰克图贸易的兴盛期,华茶逐步发展与俄国皮货一样成为最主要的商品。正如 1764 年俄国六等文官米勒教授在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所写的那样:"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35]"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茶皮贸易新时代开始了。[36]

皮货的地位

俄国对华贸易的出发点是为了换取中国的金银、丝绸、宝石等,如何换取呢? 对于俄国来说,唯一的购买力是毛皮。俄国早在十五、六世纪就致力于发展毛皮生产,对喀玛诸省的皮毛企业多所扶持。1558 年,俄国政府委派斯助干诺夫家族的商人经营乌拉尔山脉地带的皮货,1581 年,沙皇更批准其雇佣哥萨克头目叶麦克率哥萨克人越乌拉尔山脉开拓西伯利亚地区的新资源。数十年后,俄国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综西伯利全土,东部所产推皮货,狐狸、兔、貂、鼠、

獭之类皆备。"[36]除了西伯利亚外，波莫里罕的白熊皮、毕淖尔、犹哥尔、奥布多尔等地的貂皮，毕淖尔、德维纳的白狐、粟狐也极著名。俄国政府以实物税的名义从西伯利亚部落征收及以什一税名义从内地各关卡征收了大量珍贵毛皮，除供应国内需要和运销波斯、土耳其及一些欧洲国家外，仍有大批毛皮在国内找不到任何用途，再加上17世纪中叶后北美皮货的竞争，以及第三次英荷战争的影响，导致欧洲市场皮货滞销，这一切使俄国皮货"简直不知安置何处，因此必须设法寻求有利的销售市场"，"国库自然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数目众多的毛皮需求者，并且邻近西伯利亚，这对通商是极为有利的。俄国这个难题，因《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而消除了。"[37]正如前面所述，俄国对中国的皮货贸易获得了成功，西伯利亚的毛皮财富竟占当时俄国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是俄国的以皮易金计划并未实现，金银在两国贸易中作用较小，地位很低，因而大多为以皮易布。

皮货在俄国不仅是重要的出口商品，而且还是外交中举足轻重的礼品。1567年，俄国遣使去累根斯堡（拉蒂斯本）马克西米连二世处，沙皇的御礼几乎全是紫貂皮。1595年，俄国因无法用兵员、款项去支援正在与土耳其作战的基督教捍卫者鲁道尔皇帝，于是便向他提供了一项完全是皮货的军援，计有紫貂皮1003捆、貂鼠皮519捆、上等前狐皮129张、其它狐皮33700张、海狸皮3000张和麋鹿皮74张。1663年，俄国王室派使节普罗索罗夫斯基向英国王室馈赠了价值两万卢布的皮货（包括少量猎禽）。[38]至于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多是皮货，几乎每次出使都是如此。

俄国的毛皮是有等级之分的，大致分为两类：贵重毛皮与普通毛皮。后一类中，松鼠皮是最主要的项目。前一类中，至少一直到17世纪末，貂皮处于最重要的地位，西伯利亚的打开与占领就是由貂皮引起的。其中紫貂最为重要，它就是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称之为"金羊毛"的那种动物。雅库次克成为城市是在1639年，其城徽是一只鹰抓着一只紫貂。伊尔库次克原是一处征收毛皮的冬营地，直到1686年它才扩建成城市，城徽是一只老虎嘴里衔着一只紫貂，直到现在，城徽上还刻着"巴勃尔"（老虎）一词。在中世纪的欧洲宫廷，紫貂被看作是著名的奇珍，比如英国爱德华四世就曾规定"凡无爵位者不得穿戴貂皮，违者罚金十镑。"[39]海龙皮在17世纪末征服堪察加之后才成为重要的毛皮。当然，有些皮货是禁止出口的，如鹿皮、麋鹿、海獭毛等。[40]

北京贸易的自由特色

清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以广州为中心，由行商包揽一切事宜，与在北方的陆路北京贸易相比，北京贸易的自由特色就显得十分明显。北京贸易由俄国政府派商队或私商组织商队前往北京玉河桥西俄罗斯馆贸易，在贸易手续如递交公函等办妥之后，由清帝下旨宣布开馆贸易，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俄馆与俄商接洽，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虽然商品价格受中俄关系正常与否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商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制约的，这与海路公行垄断贸易及价格不同。两国商人或以货易货，或购买、售卖货物，除了规定现金结算、不准赊欠、不得买卖违禁货物如硝磺、军用器具等（海路贸易同样有此限制）以外，没有任何其它限制。来往的俄国商队的车马盘费在1691年至1720年期间由清廷提供，清廷还派军队保护俄罗斯馆，护送商队往返中国，俄商在京可自由行动，无任何限制。贸易时间虽规定为三年一次，一次80天，人数以200人（1712年后为220人）为限，但俄商从未遵守，清廷从规定之日起就未加以严格限制。俄国进出口货物全部免税。而海路贸易却无此等优待，以致于许多西方国家对俄国得以在中国陆路贸易处于此等优越的地位与受到如此良好的待遇，羡慕不已。于此可知中俄北京贸易的自由

特色。

清政府之所以对海陆路贸易规定不同的贸易政策，实由于清政府担心海外殖民势力与内地人民结合，危及自已的统治，故而对海路贸易实行公行制度，严格控制。而对于陆路北京贸易，为了与沙俄缔结解决划界、逃人问题的条约，以便专注西北，孤立西北叛军，故而采取了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

清政府对北京贸易的态度

北京贸易在清政府看来，仍未逃脱朝贡贸易的范围。伊兹勃兰特·义杰斯曾向清廷要求遣派巨商携金银、宝石前往莫斯科通商，清廷答复道："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事应无庸议"。[41]至于北京商队贸易，多有"朝贡"的特征，如商队总管携带礼物觐见清帝，清帝赐给一些礼物等。"几乎在每一个使团去北京时，都派有一个携带货物的商队随同前往。"[42]在这些使团中，有些是由俄国中央政府派遣的，有些则是由西伯利亚地方政府派遣的，由于两国陆上交通路途遥远，因此，前往中国的俄国商队大都得到了俄国政府的帮助与支持。清廷允许俄国国家商队携带俄国枢密院的信函（介绍信）定期来京贸易，俄国派有商队总管监督率领，这与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对待"四夷"遣使进行"朝贡"贸易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清政府认为，陆路北京贸易实为可有可无之事，比如清廷大臣曾向伊兹马洛夫申明，"中国并不需要俄国货物，中国之经商者仅为乞儿仆役之流"，[13]"贸易乃无关紧要的小事，对两国均无任何利益可言。"[14]事实并非如此，"盖中俄贸易，虽云互市，其实不过俄国一方之利益……商队皆为俄政府所派，收入亦即国库财源。中国则反是。"[15]至于清廷之所以答应俄国的要求发展中俄商务，只是把它作为调整两国邦交的手段。清廷所重者仅为边界与逃人诸问题，而俄国对商业贸易则孜孜以求，每当俄国拖 延清廷提出的划界要求或逃人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商业贸易必然受到冲击，反之则比较顺利。比如 1729 年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出使俄国的使团，两国邦交相形密切，所以 1731 年来华的俄国商队就受到良好的接待，清朝大臣设宴款待，并保证贸易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理藩院对自由贸易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而当 18 世纪中叶清军平叛西北时，中俄邦交因阿睦尔撒纳逃人事件等问题相形紧张时，在京贸易的俄国商队总管弗拉迪金就未能博得清帝的赏赐，官家商队前往北京的贸易也就此结束了。

---

①⑨刘选民：《早期中俄贸易考》，见《燕京学报》第 25 期。

②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第 94 页。

③⑱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8—9 页。

④何秋涛：《俄罗斯馆考》，见《朔方备乘》卷 12。

⑤⑪《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1961 年诺沃西比尔斯克出版，第 192、196—197 页。

⑥⑩苏联《新东方》杂志，1928 年，第 23—24 期。

⑦《关于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原始积累问题》（论文集），1958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438 页。

⑧⑫⑭⑲㉝㊶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 171/200、58、58、128、87/178、170 页。

⑬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 199、290—291 页。

⑮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 48 页。

⑯⑳㉑㉙㉞㊷㊹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 104、249、275/284、28、420、513、117 页。

（下转第 55 页）

⑤①同上，vol. Ⅰ，页 106。
⑤②同上，vol. Ⅱ，页 201。
⑤③Samuel Hollander，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73)，页 269。
⑤④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Ⅱ，页 202。
⑤⑤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页 538。
⑤⑥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Ⅰ，页 80 及 vol，Ⅱ，页 202。
⑤⑦同上，vol. Ⅰ，页 521。
⑤⑧同上，vol. Ⅰ，页 402 至 403。
⑤⑨同上，vol. Ⅰ，页 10。
⑥⓪同上，vol. Ⅱ，页 189。
⑥①同上，vol. Ⅰ，页 80。
⑥②同上，vol. Ⅱ，页 201。
⑥③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页 242
⑥④Acl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Ⅰ，页 242。

（上接第 44 页）
⑰见拙文《十七、八世纪中俄逃人问题述论》，《锦州师院学报》1991 年第 3 期。
㉒㉓㉗㉚㊳㊴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 1101、1114—1115、1157、1157—1161、181—182、178—180 页。
㉔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见《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卷 2。
㉕魏源：《海国图志》卷八。
㉖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之一）第 739 页。关于茶的语音问题，请参考拙著《茶的祖国—中国茶叶史话》，黑龙江科技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5—6 页。
㉘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 369、317 页。
㉛㊲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 年喀山版，第 18—19 页。
㉜《巴赫鲁申学术著作》卷三，1955 年莫斯科出版，第 242 页。
㉟见拙文《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对外经贸研究》1992 年第 2 期。
㊱徐继畬：《瀛环志略》卷四。
㊵㊺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795、765 页。
㊸刘泽荣：《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第 10 页。